

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成因分析

杜水生¹ 刘富良²

(1.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2. 洛阳市文物局文物钻探办公室)

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石器大小有着特别的含义，常常是用来判断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1972年，贾兰坡先生在总结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后提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有两个系统，其中之一是“匱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富有代表性的石器是三棱大尖状器，在石器的成分中有时含有小石器，但数量有限，类型也很少。另一个传统就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简称“第1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小石器，在石器成分中小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加工痕迹细小。在实际中也把前者叫大石器传统，后者叫小石器传统^[1]。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石器的大小的界定提出具体标准，并根据标准将丁村文化的文化性质进行重新界定^[2,3]，也有学者提出应以手的大小为参照划分石器大小^[4]。

20世纪90年代，随着华南地区砾石工业发现逐渐增多，石器大小被赋予新的含义，大型石器更多的和砾石工业联系在一起，而小石器多和小石片、刮削器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将中国旧石器文化划分为南方的砾石工业和北方石片工业的二元结构^[5]。

虽然上述认识在不同时期都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但是对以周口店和泥河湾盆地为中心的华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的认识却始终比较一致，认为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主。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石片工业时空分布的研究，了解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的成因。

一 中国小石器文化的时空分布

以小石片—刮削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不仅分布在华北北部地区，在华北南部、中国南方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也有这种类型的文化分布。

1. 华北北部地区

虽然自1972年，贾兰坡先生提出华北旧石器文化存在两大传统以来，华北北部以及辽宁南部的旧石器文化的特征就一直被认为是小石片—刮削器文化，事实上小石器文

化在这一地区确实属于主流文化，但实际上这一地区也同样存在大型的砾石工业，如果把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按照周口店地区、泥河湾盆地、辽宁南部地区来划分，其小石器文化呈现如下特点。

在周口店地区，北京猿人早期砾石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工具类型主要是刮削器和砍砸器，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少，形态也相当原始，还有一些球形器。本期砍砸器不仅数量多，占此类工具总数的一半，而且加工精致，类型也多；尖状器多较大，加工亦简单，多是一边修理较好。一直到中晚期小石器文化才成为主流文化^[6]。此后的周口店15地点^[7]、山顶洞遗址^[8]的石制品也属于小石器传统。

在东北南部地区，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砾石工业向小石器工业发展的过程，属于本区最早阶段的庙后山遗址石制品为砾石工业^[9]，从金牛山遗址开始^[10]，鸽子洞遗址^[11]、小孤山遗址^[12]的石制品都以小石器为主。

不同情况只发生在泥河湾盆地，从小长梁^[13]、东谷坨^[14]到许家窑^[15]、峙峪^[16]石器工业中砍砸器的数量非常稀少，几乎不见砾石石器，小石片—刮削器是泥河湾盆地的文化特色。

2. 华北南部地区

华北南部地区旧石器文化曾经被贾兰坡先生概括为大石片—三棱尖状器传统，或丁村—匭河系，因器形硕大也被称为大石器传统。它和华北北部旧石器文化形成对照，代表遗址有山西芮城西侯渡、匭河、襄汾丁村，陕西蓝田公王岭，豫西三门峡等，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华北南部的旧石器的文化性质要复杂地多。

在著名的丁村遗址，以54:100和54:90地点相比，54:90地点石制品多粗大，依石片分析大型者占71.83%或64.79%，中型者占23.94%或29.58%，小型者占4.23%或5.63%；石器的测量结果类似，大型者占76.67%或83.33%，中型占20.00%或10.00%，小型者占3.33%或6.67%^[17]。而在54:100地点，依石片分析大型者占18.36%或17.35%，小型者占50%或64.28%；石器的测量结果类似，大型者占25.64%或28.21%，小型者占38.64%或40.02%。不仅如此，在石器类型上54:90地点，以砍砸器为主，而54:100地点不含砍砸器^[18]。

在匭河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根据对6056地点的重新研究，该地点共获得石制品116件，一般都比较小，以重量计，100克以上者只有10件，其中300克以上者4件，500克以上者1件，大多数标本在25克左右，最小者不足3克。20件石器中，刮削器12件，尖状器5件，砍砸器2件，石锯1件^[19]。

华北南部的小石片—刮削器文化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区，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地点有河南安阳小南海^[20]、荥阳织机洞^[21]，山西陵川塔水河^[22]、山西和顺当成和背窑湾^[23]等地点，从打片技术到石器类型和峙峪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实在贾兰坡周口店1地点—峙峪系的代表遗址中就有小南海遗址。

3. 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的小石片—刮削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代表遗址有陕西长武窑头沟、甘肃东部遗址群以及内蒙古萨拉乌苏等。

陕西长武窑头沟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相当于氧同位素阶段4，石制品的石料为石英岩、石英和燧石等，打片以锤击法为主，石核有扁平石核和多面体石核，石片多数为小型而且不规则，但也有部分石片呈比较规则的三角形和窄长形。石器以小型刮削器为主，小型尖状器数量不多，但修理精致。也有砾石直接加工的砍砸器^[24]。

甘肃环县刘家岔和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氧同位素阶段3早期。

刘家岔遗址位于黄土高原西部，1977年发掘并挑选出石制品1022件，其中石器487件。石器原料90%以上为石英岩砾石，其余为硅质灰岩、脉石英和砂岩。该遗址打片主要使用锤击法，但也有砸击法。石片一般不规则，但出现修理台面的石片。石器用锤击法修理，刃缘一般不平齐。石器类型仍以刮削器为主，按照刃形和刃量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另外还有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和石球^[25]。

萨拉乌苏遗址石器的原料为黑色的硅质岩砾石，也有少量石英岩，这些砾石来自数十公里以外的产地。砾石很小一般只有2~4厘米，因此制成的石器很小，一般为长2~3厘米、宽1厘米，重量1~2克左右的数量最多。石器以锤击法剥取石片但从一部分很规整的柱状石核来看，间接打制法可能已经存在。石器修理技术比较进步，疤痕细小，刃口整齐，石器组合中以各类刮削器为最多，其次为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具等。其中端刮器最为引人注目，全部为短身类型，形状规整^[26]。

4. 华南地区

中国南方地区的石器工业主要为砾石工业，但是有些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华北小石器工业一样，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主要特征，时代一般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洛南盆地，花石浪龙牙洞的石制品和位于洛河阶地上的露天遗址的石制品完全不同，前者的石制品是以中小型石片和简单的石片工具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石料主要有各色石英岩、脉石英和石英砂岩，打片主要使用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等简单的硬锤直接打片方法，石器组合简单，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石器修理也以向背面修理为主，和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后者虽然在地理位置、时代和石料与前者相当或一致，但工具却以手镐、手斧、薄刃斧和石球等重型工具为主^[27]。

与龙牙洞文化性质类似的洞穴遗址还有河南南召小空山^[28]、湖北房县樟脑洞^[29]、湖南石门燕儿洞^[30]等。

除了洞穴遗址，在晚更新世，露天遗址中也有一部分遗址为石片工业。在湖北江陵鸡公山，下文化层为典型的砾石工业，而在上文化层石制品的原料来源可以分为两个部

分：一部分为河滩砾石来自于遗址附近；另一部分为燧石结核，来源于其他地区。在砾石原料中岩性主要为石英、石英岩或石英砂岩。石器打片与修理均使用锤击法，石片的台面主要为自然面，石器的毛坯主要为石片，加工方向主要为向背面加工，但也有1/3向腹面加工，加工比较粗糙、石器形状不十分规则，石器类型有刮削器、雕刻器和尖状器^[31]。

关庙遗址位于陕西省安康市东北约10公里的汉江北岸，石制品主要采自汉江二级阶地上。该遗址发现石制品60多件，石器原料主要为脉石英也有少量的石英岩和砂岩，均为来自附近河滩地砾石。石制品石核和石片占的比例最大，两者多为不规则形，形体较小，长度超过5厘米的石核仅1件，石片的长宽则主要分布在2.5~3厘米，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器中刮削器的数量最多占60%，尖状器次之占30%，另外还有一些雕刻器技法的标本^[32]。

5. 西南地区

同中国南方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旧石器工业和华北北部的旧石器工业相似的程度要大一些，以石片—刮削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都有分布，但是和华北北部相比又具有自身特征。

观音洞遗址先后经4次发掘获得石制品300多件，加工石器的原料为石块或结核，岩性以硅质灰岩为多，占65%，其次为脉岩、硅质岩、燧石、玉髓、细砂岩等。打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少数使用碰砧法。加工方向为正向加工为主占半数以上，反向加工占20%，另有交互、转向、错项、对向等。刃角较钝多在75°以上。修正痕迹不整齐者居多。石器类型有刮削器、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凹缺刮器等，其中前两类占90%，砍砸器等大型工具很少见。石器大多数在3~5厘米之间^[33]。

普定的白脚岩洞位于普定县西南约9公里处，海拔1280米，洞底高出附近河床约40米，附近岩溶地貌发育，多为峰林—谷地。该洞洞口朝南，比较宽敞，但洞内堆积受到较严重的破坏，洞口堆积保持比较完整。根据¹⁴C测定，年代为1.5万~2万年。经1978年、1982年两次发掘，共发现1000多件石制品及2件骨器，动物化石22种。石制品原料以燧石、硅质灰岩为主，水晶、灰岩、砂岩等也有使用，燧石呈块状，其余为砾石。打片主要使用锤击法，也使用砸击法，另外零台面石片的存在，说明锐棱砸击法也有使用。石器仍以刮削器为主，共发现400件，约占石器总数的80%，主要以各类石片和断片为毛坯进行加工。砍砸器共发现43件占石器总数8.5%，尖状器数量不多，仅20件，另外还有雕刻器、端刮器、凹缺刮器，值得注意的是有2件修背石刀和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中同类制品相似^[34]。

猫猫洞位于贵州兴义城东约25公里的猫猫山东侧的一个岩厦内，虽然岩厦大部分已经坍塌，除了保留在未坍塌部分的堆积外，岩厦的前缘也保留了较好的堆积。地层共分4层，石制品主要位于第3层。动物化石比较破碎，初步确认的有中国犀、鹿类、牛类、野猪、獾、象、窄齿熊等。猫猫洞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土了4000多件石

制品、14件骨角器等文化遗物,石器原料为质地较软的变质粉砂岩、砂岩、泥页岩等,来自3公里外的河床。打片技术主要采用锐棱砸击法。石器组合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3大类,另有1件雕刻器打法的标本及锐棱砸击石锤、砸击石锤、石砧和打击砾石。刮削器数量最多,多以石片为毛坯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形体较大,加工精制,可分单刃、复刃、端刃等。尖状器也多以石片为毛坯,向破裂面加工为主,并采用“指垫法”加工。砍砸器数量最少均以砾石或石核为原料采用复向修理技术,加工粗糙。骨角器中有骨锥5件、骨刀1件和角铲8件^[35]。

富林遗址位于大渡河沿岸的二级阶地上,该地点于1960年发现、1972年发掘,发现5000余件石制品、用火遗迹和动植物化石。石制品位于二级阶地上部,堆积集中,上下层的界限很清楚,除了用火遗迹外,还有动植物化石,这种现象应该是原埋藏的结果,从文化层不很厚的情况来看,可能是人类短期活动遗留下的。和华北地区狩猎文化遗留下的遗存很相似石制品,原料大部分来自附近山上的砾石结核,另有少量石英、水晶、石英砂岩。打片主要使用锤击法,偶然使用砸击法,石片多短宽薄,属于副产品,也有一定数量的似石叶。制作石器的毛坯以块状为主占56%,仅42%以石片加工。石器组合有边刮器、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砍砸器。边刮器数量最多,占石器总数80%,其中多数为单刃类。端刮器数量不多,但加工仔细,刃口较钝。雕刻器数量很少,且不典型。砍砸器仅有1件。富林石器工业最显著的特点是石器非常细小,长度很少超过3厘米者,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但有砸击法存在,石片中有相当数量的似石叶存在,石器以小型刮削器为主,加工石器毛坯以块状为主,片状毛坯占次要地位^[36]。

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虽然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主要特征,但和华北地区相比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一是砍砸器等重型工具的数量虽然少,但在各遗址中都有出现,说明这类工具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二是对砾石原料多采用锐棱砸击法打片,而不是锤击法打片。

6. 岭南地区

广西柳州白莲洞位于柳州市东南郊的白面山南麓,遗址堆积复杂,按照发掘者意见可分早、中、晚三期,年代从距今3万~1万年,正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在距今2.8万~2.6万年主要流行用燧石等原料制作的小型石片工具,石器主要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石器制作仍然使用石锤直接打击法,但第二步修理细致,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砍砸器居于第二位,并已经不见典型的砾石砍砸器,修理精致的小型尖状器代替了大尖状器^[37]。

7. 小结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看出,从时间上来看,多数地区都经历了一个由砾石工业向小石器工业的发展过程,只是在泥河湾盆地和西南部分地区小石器文化从早到晚一直存在。另外根据打片技术和石器组合小石片—刮削器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地方类型:在

华北北部和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的小石片—刮削器文化主要以锤击法进行打片并修理工具，工具中大型工具极少，时代延续最长；在西南地区，除了使用锤击法打片并修理石器，针对砾石石料，锐棱砸击法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南和华北南部的露天遗址，石片—刮削器文化普遍继承了此前砾石工业的一些特点，即使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虽然石片工业占据主导地位，但仍有一定数量的砾石石器。

二 对小石器文化成因的不同认识

关于石器大小的原因一直受学术界的关注，主要观点有四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小石器文化的成因是由于生态环境或经济类型决定的。

“纵观桑干河流域各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化石组合，我们不难看出，各遗址的主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早、中、晚之分，但是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共同特点说明它们都生活在以草原为主的自然环境中，并且以猎取动物为其主要经济活动，为了适应狩猎和生活的需要，都以细小石器为其使用工具。”^[38]

“在小石器组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各种类型的刮削器，而承担重型工作的大型工具类型的砍砸器所占比例很少，大尖状器基本不见。这种石器组合应该是适应草原环境的产物。它所代表的经济类型要比大石器类型要更为复杂。比较清楚的是有与加工动物肉类有关的活动的存在。小石器组合中缺少承担重型工作的大型砍砸、挖掘等工具，这应是因为在其生活环境下少有这类活动而已。小型工具除了承担切割肉类等，也可以用来采集植物类的食物或承担其他类型的工作。”^[39]

第二种观点认为，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的成因是由于石料的性质所决定的。

“小长梁当地石料的来源十分丰富，但质地较差，与理想打片所需的匀质硅质石料相去甚远。由于石料裂隙非常发育，我们认为这一特点会对小长梁工业的打制技术与石制品特征与尺寸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这样的观察也和打制实验的结果相吻合，“大部分石片和碎屑块不是循打击方向破裂，而是沿其内在裂隙崩落，很难从锤击的方向与力量来控制石片的剥离与尺寸。”^[40]

第三种观点认为华北北部长期保持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传统的旧石器文化正好印证了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的理论^[41]。

第四种观点是通过对洛南盆地内旧石器区域文化的研究提出来的。在洛南盆地，龙牙洞内的石制品是以小石片—刮削器为特征的石器工业；而在旷野，时代相同的阶地上出土的石制品却是以砍砸器、手斧等为主的石器工业。两种不同类型的石器工业同时并存于一个小盆地内，制作石制品的原料也完全相同，因此在洛南盆地用石料和环境难以解释龙牙洞内的石制品为什么是小型的石片石器，而野外阶地的石器是大型的砾石工业。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原研究者认为是由于两个遗址使用功能上存在差别^[42]。

另外，也有学者从埋藏学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在丁村，不同地点石制品的大小与类型也有不同，研究者通过对丁村遗址各地点石制品大小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对应关

系的分析认为处于河流上游的石制品尺寸较大,而处于河流下游的石制品尺寸较小,进一步推测,石制品的大小是由于埋藏过程中由于河流分选所致^[43]。

但是,仔细分析上述因素,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完满地解释小石器文化的成因。比如,如果说环境变化是影响石器大小的因素,那么在更新世期间,冰期—间冰期发生过多次气候波动,我们目前没有发现石器大小随气候变化反复由大到小、有小到大的例证,说明小石器可能并不仅仅用于狩猎,大型工具可能也并不单纯用于采集,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工具组合砾石工具中也不乏小型的石片石器,小石器组合中也有少量的大型工具,即便是在某个遗址中大型工具缺无,由于石制品只是原始人类使用工具的一部分,其他材质的工具可能由于年代久远无法保存至今,因此仅仅根据现在发掘的石制品来确定原始人类的经济类型是相当危险的。同样如果说石料是影响石器大小的因素,那么在周口店第1地点、鸡公山遗址中石器在同一个遗址的早晚期会有不同的石器工业又将如何解释。

看来,控制石制品大小的因素可能是复杂的,可能不止一种因素影响石制品的大小甚至类型,因此在分析小石片—刮削器文化的成因时,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应该弄清哪些因素是影响石器大小的主要因素,它能在较大范围内影响旧石器时代文化性质的变化,哪些因素只在局部影响区域文化甚至某一遗址的文化性质。

三 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成因分析

为了解决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的成因,我们先把研究区域的旧石器文化划分为若干小区,对每个小区里的旧石器遗址的埋藏环境、石料特点、生态环境、遗址的使用功能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了解究竟哪个因素在文化成因中起着决定性因素,最后再对整个区域进行总结。

1. 泥河湾盆地东部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根据目前的研究,泥河湾盆地东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年代属于早更新世,从距今160万年延续至距今90万年。动物群研究表明这一阶段气候的主要特征是温暖湿润,时代为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动物群是森林—草原动物群,其中森林动物多于草原动物,气候温和湿润。例如新猎豹、纳玛象及黑鹿等都是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活^[44]。孢粉分析表明在距今248万~97万年前泥河湾盆地植被中木本植物占较大的比重,禾本科植物茂盛,反映了一种比较湿润的气候环境^[45]。

制作石器的原料来自遗址附近,根据野外观察这种石料主要分布在侏罗系浅成侵入岩和震旦系燧石白云岩的围岩之间。隐晶硅质岩主要分布在东谷坨一带,多沿层面或节理面呈片状、块状和板状,这一点在东谷坨的火石沟一带观察最为明显。除基岩外,在东谷坨一带,在湖相地层底部和基岩相交接的部位,普遍发育有一层砾石层,在这层砾石中含有大量的隐晶硅质岩和火山角砾岩砾石。东谷坨一带的隐晶硅质岩的力学性质可

分三类：第一类表面有一定的风化，质地均匀或不均匀，裂纹发育；第二类，质地细密匀纯，没有风化，但裂纹发育，且裂纹多被不同物质所充填，板井子的石料具有这种特征；第三类，结构细密匀纯，无风化、无裂纹，油坊遗址中有这种石料。根据对石料表面的观察，泥河湾盆地东部早期旧石器文化所使用的原料主要为第一类石料^[46]。

根据遗址的埋藏情况和遗址出土的遗物、遗迹分析，不同遗址的使用功能有所不同。东谷坨遗址不仅堆积厚而且含有精制品的数量也比较多，反映人类在这里从事一种比较复杂的活动，而且使用时间比较长，具有类似中心遗址的性质。相比之下岑家湾遗址文化层薄，石制品多为初级产品，可能代表人类的一次临时活动的场所，飞梁遗址也同样反映了相类似的使用功能。

从埋藏学的角度来看，位于泥河湾盆地东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均属于湖相堆积，随着湖水的涨落，湖进人退，湖退人进。有的遗址废弃后被快速埋藏，形成原地埋藏如岑家湾遗址^[47]；有的则随湖水的涨落被流水改造，形成异地埋藏，如飞梁遗址、半山遗址^[48]等。

综上所述，泥河湾盆地东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石制品的大小显然与遗址的使用功能、埋藏性质没有直接关系，和经济形态也没有关系，石制品的特征主要由原料的性质所决定，这一点得到打制实验的证明。

2. 周口店地区

从距今 50 万年开始，人类在周口店地区一直连续地生活着，在此期间经历了数次冰期—间冰期的气候波动，但由于气候波动的幅度不同，因此有些时期冰期—间冰期气候的差异并不大，而有些冰期时的干冷气候表现的相当明显，根据孢粉和动物化石的研究代表北京人文化早期的 8~10 层，以温暖湿润的森林动物为主，喜水或近水动物较多。而代表北京人晚期文化的 1~3 层则以草原动物为主，喜干燥种类多^[49]。

从原料的来源看，北京猿人早期文化中从数量来看虽然以石英居多，但主要工具都是用砂岩等砾石制作的，虽然砂岩只占本期石料的 15%~20%，但其实际作用要大于石英，根据笔者调查在现代周口河中有大量的砂岩和质量较差的脉石英。因此估计在北京猿人文化早期，石料主要来自遗址附近的周口河中，据此推测人类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遗址附近。到了北京猿人文化晚期，在原料采集方面不仅以脉石英为主，而且质量有所提高，质地细腻的乳白色或半透明的石英的数量大大增加，水晶和燧石的用量也明显增加了。据调查，这些原料在遗址附近的河床中很少见到，主要存在于距遗址 5~6 千米之外的房山花岗岩体附近，指示了人类在这一阶段可活动范围比以前有所扩大^[50]。

从遗址的使用性质来看，周口店一带的洞穴为人类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家园，洞穴或岩厦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冬暖夏凉，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场所，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中心遗址。

在北京人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石器工业经历了从砾石工业向小石片—刮削器工业的转变，对于这种转变学者已有过研究：“在北京人文化早期（8~9 层），也就是粗大石

器时期,是一个气候非常温暖的阶段……周口店附近地区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甚至于还保留亚热带的蕨类植物,以砍砸器为主体的粗大的石器组合很可能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在此后,由于更新世气候变化的整个趋势的影响,气候总体方向是朝干冷的方向发展,周口店附近的环境,也主要是较干凉的草原或森林草原环境。所以中晚石器小型石器的发展,明显是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发展出现,同样情况也见于辽宁营口金牛山。”^[51]

其实,石器的大小除了和环境变化具有明显的关系外,也和古人类的活动范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北京人文化早期,人类主要活动在遗址附近,而到了晚期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在5公里以外活动频率大大增加。这和石器大小可能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在北京人晚期文化以后,虽然气候也曾经发生过变化,但在15地点和山顶洞,石制品一直保持小石片—刮削器传统,大型的砾石工具很少出现。

类似的现象在华南地区也存在。以鸡公山遗址为例,在鸡公山遗址中上下文化层的石制品有一定差异,下文化层属于典型的砾石工业,原料均为砾石,但岩性比较庞杂有石英砂岩、砂岩、燧石、石英等原料。打片与修理均使用锤击法,石核以单台面居多,没有发现修理台面和预制台面的情况,石片数量很多,但多是天然台面。石器类型仍以砍砸器为主,但尖状器最有特色,多是将一长条型砾石从一侧剖开,然后在—端向背面加工,修出一个三棱状的短尖,这种石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加工方法固定。除此之外还包括重型刮削器、轻型刮削器、凹缺刮削器等。

上文化层的原料来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河滩砾石来自于遗址附近;另一部分为燧石结核,来源于其他地区。在砾石原料中岩性主要为石英、石英岩或石英砂岩。石器打片与修理均使用锤击法,石片的台面主要为自然面,石器的素材主要为石片,加工方向主要为向背面加工,但也有1/3向腹面加工,加工比较粗糙、石器形状不十分规则,石器类型有刮削器、雕刻器和尖状器。

由上述分析可见,鸡公山遗址的石制品也经历了一个由砾石工业向石片工业转变的过程,而且伴随着这种转变人类的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气候开始向干冷方向发展。

因此,石制品由砾石工业向石片工业转变过程中,除了和气候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外,和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大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大既可能意味着人类体质的进步和适应环境能力的增强,也可以解释为由于环境变干变冷迫使人类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内活动,二者之间究竟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果,确实难以区分。不过考虑到在更新世期间,冰期—间冰期曾经发生多次变化,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地区砾石工业和石片工业反复变化的例证,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由于人类自身进步和文化本身发展所固有的规律在由砾石石器向石片石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否认环境变化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有趣的是通过对北京人头盖骨的研究,属于北京人文化晚期的V号头骨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

3. 泥河湾盆地西部

泥河湾盆地西部是华北北部小石片—刮削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也是贾兰坡先生提

出第1地点—峙峪系学说的主要依据所在,主要包括许家窑遗址、峙峪遗址、西白马营遗址、神泉寺遗址、新庙庄遗址等。

根据前面对地层、时代和文化分期的研究,许家窑遗址可能属于阶段4~6,其他几个遗址属于阶段3的晚期,大多时候处于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

泥河湾盆地西部遗址中脉石英是人类选择的主要石料,其次为有一定风化的火山角砾岩和体积较小的玉髓。脉石英和风化的火山角砾岩脆而硬,打片时和泥河湾盆地东部的石料很相似,很难获得较大一些的石片,而玉髓虽然质地优良,但由于体积很小,也不能剥取大一些的石片。

从遗址的堆积和出土的遗物来看,上述遗址应该都属于中心遗址。从埋藏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属于河湖相堆积,但并没有经过河流分选,属于原地埋藏。

泥河湾盆地西部遗址文化成因主要受石料限制,当然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些遗址的年代均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选择这些石料究竟是一种刻意行为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根据现有资料还难以回答。现在只是从使用的石料来看,人类难以制作重型工具。

四 结 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华北北部小石片—刮削器文化的成因主要受两个因素控制,一个因素是受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控制,即从旧石器早期到晚期旧石器文化存在一个由砾石工业向石片工业发展的趋势,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华北北部的周口店地点群,在东北地区、华北南部、华南、岭南地区同样存在,这是华北北部旧石器文化中出现砾石工业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因素就是不同地区石料的性质,由于早期人类活动范围有限,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合适的石料加工工具,因此当地石料的力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性质,是影响区域文化性质的因素,在泥河湾盆地由于劣质石料的影响,人类只能生产以小石片—刮削器为特征的石制品。

谨以此文恭贺吕遵谔先生八十华诞!

注 释

- [1]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39~58页。
- [2] 张森水:《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3期,195~213页。
- [3] 张森水:《丁村54:90地点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209~222页。
- [4] 卫奇:《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223~238页。
- [5]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的几个问题》,《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
- [6]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 [7] 高星:《周口店15地点剥片技术研究》,《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3期,199~215页。
- [8] Pei W C. The Upper Cave industry of Choukoudien, *Palaeontol Sin, new ser D*, 1939 (9): 1~41.
- [9] 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庙后山——辽宁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 1986年。
- [10]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129~136页。
- [11] 鸽子洞发掘队:《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122~136页。
- [12] 张镇宏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1期,70~79页。
黄慰文等:《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3期,259~266页。
- [13] 尤玉柱、汤英俊、李毅:《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1期。
- [14] 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
- [15]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97~114页。
- [16]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39~58页。
- [17] 同注[2]。
- [18] 同注[3]。
- [19] 陈哲英:《独头旧石器的新发现》,《山西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5~57页。
- [20]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1~28页。
- [21] 张松林、刘彦锋:《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1期,1~17页。
- [22] 吴志清、孙炳亮:《山西河顺当城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群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1期,39~48页。
- [23] 陈哲英:《陵川塔水河的旧石器》,《文物季刊》1989年第2期,1~12页。
- [24] 盖培、黄万波:《陕西长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物》,《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18~28页。
- [2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35~47页。
- [26] 黄慰文、侯亚梅:《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范家沟湾1980年出土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4期,311~320页。
- [27] 王社江、张小兵、沈辰等:《洛南花石浪龙牙洞1995年出土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2期,93~110页。
- [28] 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4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1~15页。
- [29] 黄万波、徐晓风、李天元:《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4期,298~305页。
- [3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县博物馆:《石门县燕子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湖南考古辑刊》1994年,1~7页。
- [31] 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102~114页。
- [32] 王社江、李志厚:《安康关庙旧石器地点》,《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1~10页。
- [33] 李炎贤、文本亨:《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 [34] 李炎贤、蔡回阳:《白岩脚洞石器类型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4期,317~324页。
- [35] 曹泽田:《猫猫旧石器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第1期,155~164页。
- [36]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期,14~27页。
- [37] 周国兴:《再论白莲洞文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203~264页。
- [38] 尤玉柱、李壮伟:《关于峙峪遗址若干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 [39]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44页。
- [40] 陈淳、沈辰、陈万勇等:《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1999年第3期,225~239页。

- [41] 吴汝康、吴新智：《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1999年，219～234页。
- [42] 同注 [27]。
- [43] 王益人：《从河流埋藏环境看丁村遗址群的文化性质——与张森水先生商榷》，《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2期，158～169页。
- [44] 计宏祥：《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地理分布与划分》，《地层学杂志》1987年第2期，91～102页。
- [45] 袁宝印、朱日祥、田文莱等：《泥河湾组的时代、地层划分和对比问题》，《中国科学》(D)1996年第1期，67～73页。
- [46] 杜水生：《泥河湾盆地东部早期旧石器文化的石料与文化性质探讨》，《文物春秋》2002年第2期，8～17页。
- [47] 谢飞、李珺：《岑家湾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物及地点性质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3期。
- [48] 卫奇：《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223～238页。
- [49] 黄培华：《猿人洞的溶洞演化和堆积旋回与北京人的生活环境》，《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2期，101～119页。
- [50] 同注 [6]。
- [51] 同注 [39]。